



电影的
别人的留
过电影时
各种情感
都能打破
人生！
在于你有
私可以幸
让别人分
无论美丑
人生美好
人同样。
多，你需
和幸福的
隐私就像
样。

纯艺术：酷儿电影

对于同性恋现象的另一种诠释



**纯艺术：
酷儿电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纯艺术·酷儿电影 / 李二仕著.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3

(电影图书馆)

ISBN 978-7-80220-440-9

I. 纯… II. 王… III. 电影评论—世界 IV. 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299 号

出 版 人: 田辉

责任编辑: 刘晓雪

出 版: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4)

电 话: 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68469781 (发行部)
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qh1985@126.com

印 刷: 北京威灵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

插 图: 400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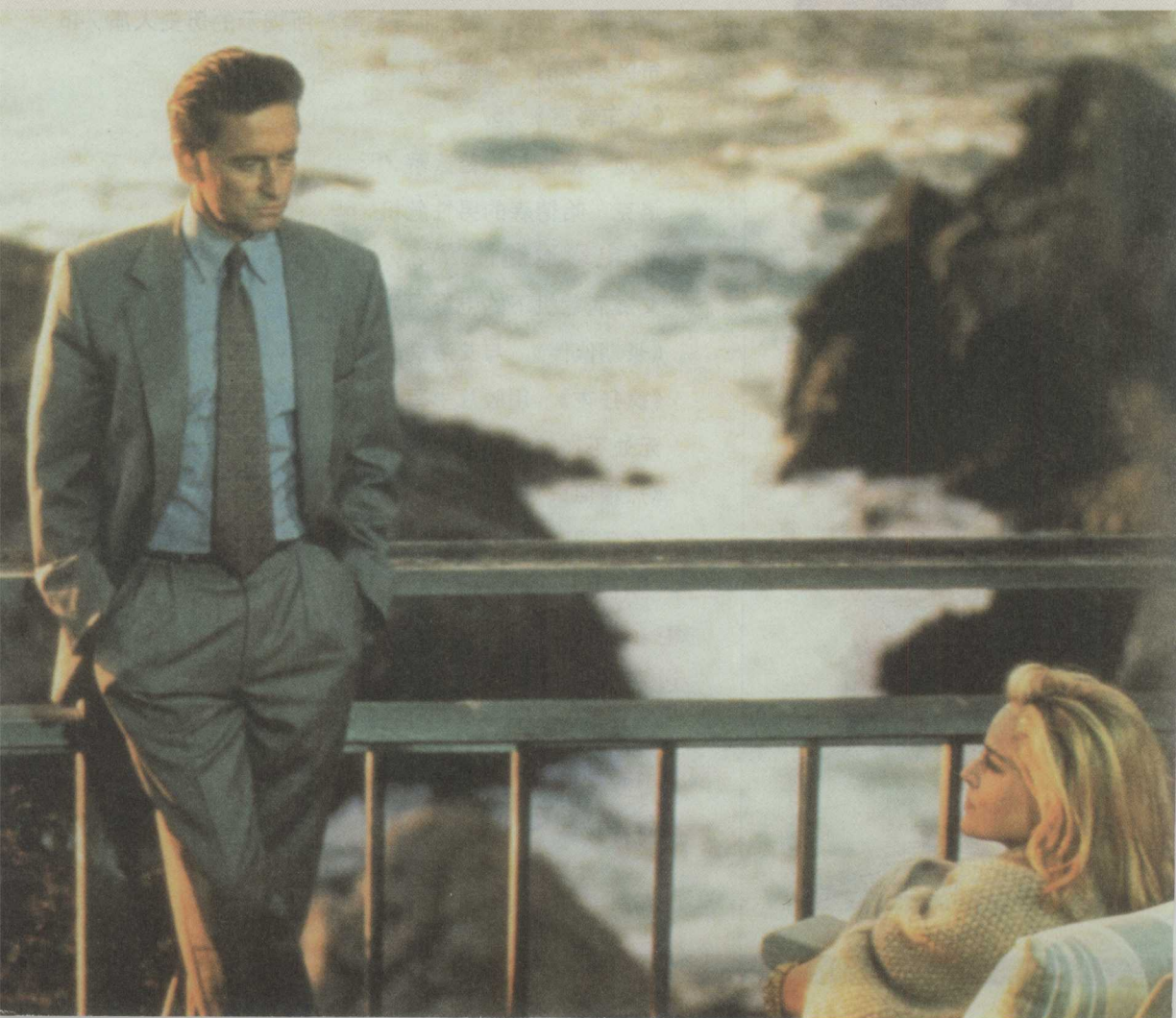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80220-440-9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纯艺术： 酷儿电影





一、酷儿特质：游移的身份，流动的欲望 /7

二、历史和现实交织融生 /12

从同性恋到酷儿：简短历史 /13

《孩子的时刻》：密柜时期的压抑 /18

《活出真我》：青春少年的自我宣言 /29

经典解读：人质和物质的编码与解码 /42

詹姆斯·威尔：《众神与恶魔》所揭示的历史人质 /46

希区柯克的《蝴蝶梦》 /54

《火车怪客》 /57

朱迪·嘉伦与坎普读解 /63

洛克·哈德森的男性危机 /69

酷儿电影遭遇性革命 /76

艾滋病危机下的电影再生 /89

《长期伙伴》：与艾滋病的生死搏斗 /89

《疯狂夜》：用胶片书写生命的挽歌 /98

无处不在的酷儿现象与电影 /102

《热情似火》 /102

《金色眼睛中的映像》&《蜘蛛女之吻》 /106

三、新酷儿电影：过渡与超越 /111

电影节和理论学者的推波助澜 /112

过渡人物：盖斯·范·桑特 /114

《大象》 /120

新酷儿电影的开山之作 /125

《毒药》 /125

目录

四、好莱坞今日的酷儿局面 /127

酷儿跃身主流电影 /129

《男孩别哭》：雌雄莫辨，感情唯一 /129

《限度》：女性情谊与类型叠合 /134

《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人人都想玩“酷” /138

欲望的新法则 /145

《我的情感目标》：异性恋女人与

同性恋男子的新关系 /145

《猜·情·寻》：不定感情的猜测与追寻 /153

五、全球的新酷儿浪潮 /158

亚洲的酷儿风暴 /170

韩国：《爱的蹦极》 /170

日本：《花与爱丽丝》 /176

中国：缘起·《喜宴》、

《春光乍泻》·港台流行风 /181

历史名人的真生活 /195

《三岛由纪夫传》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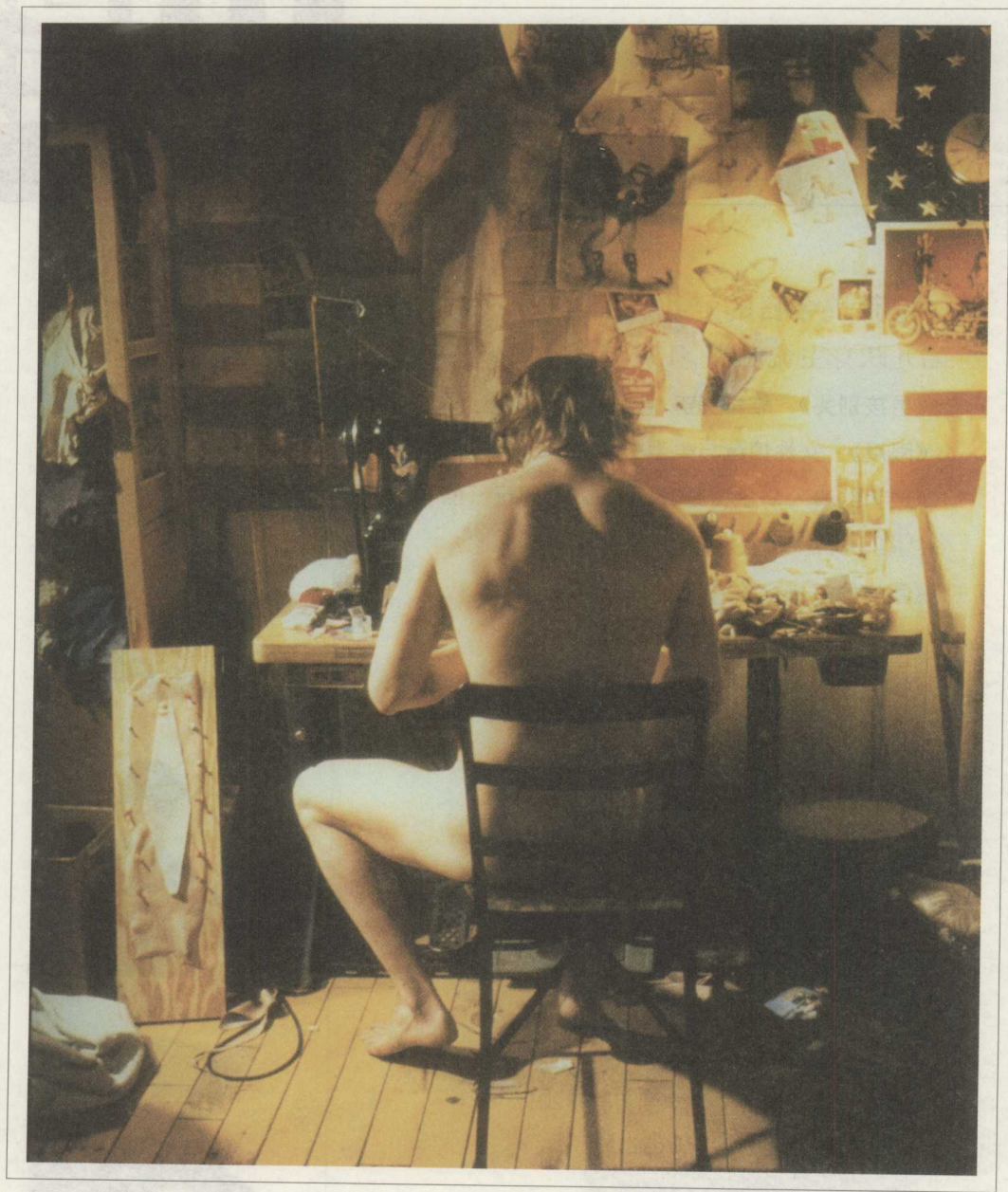
《王尔德》：说出了名字的爱情 /201

告知

编写本书使用了大量图片，因无法与每位著作权人取得联系，如您确定是使用了您的图片，又没有即时付给您稿费，请与我们联系。您应得的稿费我们已经预留。

E-mail: huanying_nin@163.com





▲ 1991 《沉默的羔羊》



一、

酷儿特质：游移的身份，流动的欲望

Queer 这个词从字面上理解，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奇怪的，可疑的，不舒服的；行为古怪的，反常规的或不合传统的；专指对同性恋的贬蔑称呼；从词源上来讲，可能源自低地德语，即德意志北部和西部使用的德语，有倾斜的，偏离中心的意思。

现今西方电影和大众文化理论及其批评界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酷儿理论，其本质是对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在跨越了以前众多的理论批评和研究方法，兼顾了多种学术领域和界限的同时表现出一定的违规逾越原则。酷儿理论同女性主义共享的兴趣点在于，两者对社会性别都有非常规的表述和呈现，而与男女同性恋以及双性恋研究关注的共同点，则集中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非异性恋的表述和呈现。酷儿电影和大众文化理论及其批评是对女性主义和男女同性恋多方运作的继承和延续，但自身相应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一系列针对固定身份政治说的质疑，因为爱滋病而产生的激进主义，以及围绕“政治正确性”而展开的讨论，这些都在学术界内外为重新理解“酷儿”这个词奠定了基础。在进入90年代以后，“酷儿”和“酷儿性”在电影和大众文化理论批评及其实践当中被广泛应用，而且对此的理解也出现了差异。有的人赶新潮地把“酷儿”看成是“同性恋男子”的同义词，或者比较个别地用来指称“同性恋女子”，甚至有的人把它当作一个新的集结术语，用来指代男女同性恋（有时候是双性恋）。

“酷儿”（Queer）和“酷儿性”（Queerness），这两个词除了被看作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的同义词之外，作为一个新术语，更为主要地体现在它在已经建构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电影和大众文化及其批评的语境中是如何运用的。在这些用法当中，“酷儿”也许被用来描述在某位观众、某个文本或者某种个性里面多重“非异性恋”性别身份和位置的交叉与重合。举例来说，在像《绅士偏爱金发女郎》（1953）或者《彗星美人》（1950）这样的电影文本里，就积聚着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文化读解。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酷儿的文本，而不是通常说的仅为单一的男同性恋或者女同性恋



▲《众神与恶魔》剧照

或者双性恋的电影文本。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玛琳·黛德丽和贝蒂·戴维斯是拥有酷儿特质的明星形象，因为她们同时激发了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文化欣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文本或者演员的明星形象并没有必要一定具备（也就是所谓的“外延的”）

非异性恋的要素来保证“酷儿”的称谓，它们只需要聚集并引发一些非异性恋的文化读解。

事实上，一些酷儿怪异论的批评家承认，许多的大众文化文本都包含有明显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或者别的非异性恋的角色和内容——比如《沉默的羔羊》——但是这并不一定就构成酷儿的文本，因为这些元素是用来压制并且消除酷儿性，而不是为了来表现酷儿性。上面涉及“酷儿”的用法一般都很小心谨慎，这个概念不会替代那些特别存在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批评角度、读解视点以及欣赏快感。它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整理并协调这些关照角度、理解方式和快感认知，从而为电影和大众文化的批评方法建立起一系列的“非异性恋”的特质（也就是我们要说的酷儿）。

接下来与上面描述酷儿这个概念的使用方法略有变化，就是用它来描述不同“性倾向”的人在接受同原初文本明确具有的产生条件、呼应对象不相一致的地方。他们在看待同一文本而表现出来的非异性恋的认知态度、身份位置、快感方式和读解结果。比如，一个同性恋男人可以从一个女同性恋的文本里获得的快感，或者一个女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女人在导演某部具有男同性恋内容的电影，或者写一篇论文，比方讨论关于肯尼斯·安杰尔电影当中色情欲望的时候，她所做的这些工作就可以说带有酷儿性。还有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她们已经开始用“酷儿”这个词来表述在电影和大众文化的制作和呈现当中，任何由异性恋女人（有时候是异性恋男人）做出来的、或者是有关她们对于社会性别的所有非常规社会性别的表达。但是无论是否和女性主义有关联，如此对“酷儿”的理解，就可以用来描述任何认同于异性恋的电影和大众文化理论家、批评家以及制作人，所关注的非常规的异性恋状态。

正如“酷儿”这个词在指代那些组成新酷儿电影运动的许多电影和录像一样，前面谈到它在涉及批评和理论方面的用法是在自由女性主义者理论和男女同性恋“身份政治学”方法的框架内展开，主要是延续并维持了社会性别的差异性以及生理性别的正统性。然而，酷儿电影理论的另一变种在一些专家学者的倡导下，变得更为激进，因为它集中关注观众学、文化读解法和文本代码系统。而这些方面所提示并建构的空间已经超越了传统保守的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根据这样的定义，“酷儿”这个词被用来指认那

些有所跨逾的电影和大众文化的文本、观众的身份位置、快感方式和读解结果。它们所清晰建构的空间超越了社会性别的二元论以及生理性别的传统划分；它们或者逾越了常规异性恋对于性别的理解；或者逾越了传统男女同性恋对于性别的理解。这类的酷儿电影和大众文化理论



▲《众神与恶魔》剧照

论及其批评，它们所关注的命题，既不是陷入对异性恋的现行定义和理解，也没有落入女同性恋主义和男同性恋现象的窠臼里——甚至与双性恋涉及的层面也不同。但是到目前为止，在电影和大众文化理论和批评里面，这一领域被给予的关注还非常少。

从根本上来说，在如此定义的“酷儿”领域，这样的理论、批评以及电影和大众文化的文本将会谋求审视、挑战并且颠覆传统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划分和归类。这一领域的电影和大众文化所进行的工作，就是寻求把既定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分类引入瓦解的途径。同时，在许多电影和大众文化的制作、消费和接受实践中揭示固有术语和概念在表述和呈现方面的局限性和不准确性。举例说，“男性阳刚的”、“女性阴柔的”、“异性恋的”、“女同性恋的”以及“男同性恋的”（或者，时下通用的一个词“同性恋的”homosexual），这些术语无论是联系在一起，还是单独使用，都无法完整准确地描述凯瑟琳·赫本在电影《塞尔维娅·斯佳丽》（Sylvia Scarlett, 1936）的故事叙述中化装成一位年轻男子的形象以及观众对此所作出的反应。

前面列出的术语清单里面省略了“双性恋的”和“雌雄同体的”（androgynous）这两个词，因为有一些认定酷儿或酷儿性这个概念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他们在著述中认为，在已经

确立的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概念里，双性恋（bisexuality）和雌雄同体（androgyny）提供了两个最好的起点，理论和批评的角度由此出发，从而促使电影和大众文化批评及其理论超越社会性别的差异以及传统保守的生理性别的分类。这或许是因为双性恋和雌雄同体经常被理解为处于

▼《孩子的时刻》剧照





▲《我最好朋友的婚礼》剧照

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二元分法的“中间”或者之外的位置。同样，还有一些著述者正在检验并研究易装癖(transvestism)和变性状态、变性主义(transsexuality—transgenderism)，他们认为这是发展电影和大众文化的酷儿理论和批评方法的潜在领域，这样的方法是对传统保守的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分类的更为激进的违规和逾越。

既然针对电影和大众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当中的酷儿性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相应的理解结果、运作方式和研究方法，那么要建立单一的酷儿“政治学”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有的著述者把“酷儿”这个词专门用来指称某类电影、录像、文章和书籍，它们对那些有关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思考表现出超前或者激进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事实也表明，目前“酷儿”和“酷儿性”这两个概念已经或者正在应用于电影和大众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当中，同时它们参照对应了从保守到激进的各个层面的广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和处境。

但是在它们众多界定的以及政治形式的一两个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迹象，这些迹象表明在电影和大众文化已经建构的理论和批评领域，它们正处于被酷儿化的阶段和过程。比如说文本的编码和观众学就是这样。某些酷儿电影和大众文化的理论家已经深刻地挑战了在此之前的种种学说，他们宣称所谓的潜在意思(subtexting)，蕴涵的含义(connotation)这些概念和语

▼《孩子的时刻》剧照



汇主要是异性恋中心主义者所使用的范例，用它们来破坏、摆布或者否定那些一样具有“指示性外延意义的”(denotative)一系列非常规异性恋的读解。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酷儿的文本读解(解码decoding)就不是“另类读解”，也不是“亚文化的读解”，而是同异性恋读解一样正常，可以平起平坐。酷儿的读解关于观众学方面的理论吸收了女性主义的观众学和社会性别学的一些成果。它的观点是：观众，无论他们自己声明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身份，他们经常让自己的位置和立场“酷儿化”——也就是说：观众把自身放置在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空间里，而不是和他们公开认同并宣称的身份保持一致。该观点最为激进的是，如此经常变动不定的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身份和位置在涉及到电影和大众文化的时候，就会让观众丧失任何特定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归类，而没有身份和归类感地来参与读解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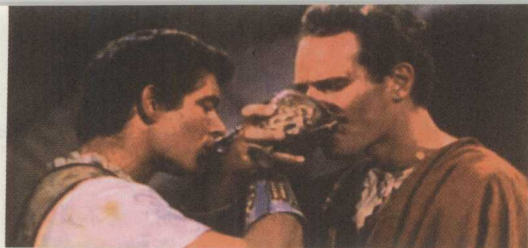
历史研究，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批评，作者论，类型研究，接受理论，心理分析学，女性主义，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方法，这些理论学说和研究都被酷儿电影、大众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重新加以审视、再批评、补充、修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遭到拒绝和排斥。他们要么在非(正统的)异性恋的方法之间寻求可以彼此接合的方式和途径，要么积极准确地审视并全面考查那些跨逾现存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分类的电影和大众文化的那些空间和领域。

综上所述，这个词曾经被贬蔑地用来表示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敌意，现在被学术界用来描述人类性别身份所表现出来的开通、流动，且不断富于变化的范畴和状态。事实上，这个概念是要打破一切分类，其立论基础是：性是一个广袤而且复杂的领域，它不仅包含了个人的行为或者倾向，而且它还会涉及到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因素。根据西方的一些知识和理论的认识，人们的性欲不是天生就该固化的。正是多方面的事实界定并创造了人们行为和倾向的条件和基础。因此，酷儿理论摒弃一切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中心主义论者，以及简单生理学的划分标准。该理论强调的是人在性方面表现出来的倾向和行为，是游移可变的。性倾向和性选择，是一种社会建构起来的个性和立场。

▼《鸟笼》剧照

总的来说，酷儿理论颠覆了以西方白人男性异性恋者为中心的性观念模式，而在容纳了男女同性恋的性欲倾向的同时，也包含接纳了双性恋、性别转换、跨种族的欲望等各种非常规和非传统定义的多样形态。所以，当今有一种潮流，就是别人问及你的性倾向时，“你是异性恋者吗？”你说：“不。”而当别人再次问及：“你是同性恋者吗？”你的回答还是“不”。最有包容力的回答是：“我是酷儿。”这样一个流行一时的玩笑话，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酷儿”在包容各种说法的时候所具有的颠覆性和解构力。





二、

历史和现实交织融生

这一章共分三个部分的内容。首先历史性地铺陈了从同性恋电影如何发展到酷儿电影的阶段。主要例举了两部影片：一是以美国著名导演威廉·惠勒拍摄、奥黛丽·赫本主演的《孩子的时刻》，来揭示历史上表现同性恋的电影的艰难曲折。该导演属于美国主流电影导演，曾经拍摄过《宾虚》、《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罗马假日》、《滑稽女郎》等经典作品，《孩子的时刻》是他第二次根据莉莲·海尔曼的戏剧改编而成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改编，因为电影审查法的限制，以及他本人认识上的不足而受到了约束，把其中潜在的女同性恋表现处理成一个三角恋爱关系的纠葛。到了60年代较为开放的时代，他最终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理解。殊不知，他在《宾虚》里，就描写了两个男人的微妙情谊；另外就是英国一部带有轻喜剧味道的《活出真我》。该片表现了青春萌动的少年如何克服自我障碍，以及学校和社会的舆论、家长的压力，最终勇敢地道出了自我心声，无奈地与怯懦的情人告别，并且为表白自己真实的身份而自豪，同时他赢得了自尊和自立，也得到了朋友、开明母亲、主任教员以及部分同学的支持和理解。

其次就是选取了四个经典的电影人物，包括从英国去了美国的著名导演詹姆斯·威尔和希区柯克，以及两个重要的标志性男女演员，洛克·哈德森和朱迪·嘉伦，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具体的作品，来详细探究潜隐在历史个案和文本里的酷儿特质。

第三就是揭示了美国社会在经历了性革命之后，遭遇了艾滋病的爆发，以及这场世纪瘟疫在电影中的表现。英国第一部获准在美国公映的同性恋电影《受害者》中的主人公因为是同性恋，而与传统法律和道德相悖逆，但是身为大法官，又是有家庭的丈夫，有孩子的父亲，他在面对真实情欲的纠葛，如何冲破种种障碍，为了无辜死去的同性情人，而与社会上的讹诈团伙展开比生死选择还艰难的斗争，这部影片深刻揭示了男主人公历经种种曲折的心理重担；当来自社会世俗的歧视和偏见有所缓解的时候，《长期伙伴》揭开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80年代末艾滋病的出现和蔓延带给同性恋社群的恐慌。宗教界和保守势力利用自然的病症来加大攻击的力度，宣扬这是一次“天谴”行动。但是在困惑和灾难面前，他们继续工作，取得了在电视上播映自己真实生活的空间，而且友谊和关爱最终战胜了一切。生活虽然发生了不尽如人意的变化，但是毕竟人们挺过来了。《疯狂夜》戏里戏外揭示了法国导演秘密的个人生活，他因为得了艾滋病，却以最后的余力表达了对生命的眷恋，对感情的追求和渴慕。此外，大量的关于非异性恋的情感表现出在各个国家的电影里，从而揭示出“酷儿”理论的立论基础之一：真实的生活所孕育的真实情感，它并不是来自道德上的洁癖和单个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存在于多形态的复杂交织状态。

从同性恋到酷儿：简短历史

根据一些性学历史专家的说法，“同性恋的”(homosexual)和“异性恋的”(heterosexual)这两个词是在19世纪晚期才被创造出来，而且是直到20世纪中期才进入到西方社会公众话题的领域。当然，同性恋的欲望和行为在此之前已经存在。通过追查指代词的演化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20世纪以来，人们是如何理解性行为和现象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词的使用最初是用来描述“变态”的性行为及其实行这种行为的人。起初，homosexual这个词指的是实行同性性行为的人；而heterosexual这个词指的是那种在婚姻关系之外实行的异性性行为的人。但是随着20世纪的演化推进，heterosexuality逐渐转化成男女性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欲望，异性恋被圈定为“正常的”性取向；而homosexuality指代的同性恋始终被笼罩在“不正常”的阴影下。

同性恋这个词本身在理论方面的表述和定义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里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20世纪初，同性恋这个词主要是和社会感知性别(gender identity)，也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感知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相信如果一个男人对别的男人产生性方面的吸引力，那是因为这个男人身上绑缚的实际上是一个女人的魂灵。同样的，如果是一个女人对另外的女人产生性方面的吸引力，那是因为这个女人身上潜藏的是一个男人的魂灵。当代的理论和科学，分别用两个同样表达性别转换的词来描述旧有模式的同性恋认知，这两个词分别是“transgender”和“transsexuality”。这其中依据的是一种感知性别身份的概念：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像男人还是女人？今天，性欲是以一种客观的选择来界定的：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是对男人有吸引力，还是对女人有吸引力，还是两者都有吸引力，或者两者都没有吸引力？早期的性科学家用“性倒错”(invert)和“第三性”(the third sex)来描述同性恋，这就使得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这两个概念和范畴变得更为含混和复杂。根据这两个词的设定，具有传统女性特质，即非常阴柔的女人与另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时，通常不认为是女同性恋者；具有常规男性特质，即非常富于侵占性的男人与另外的男性发生性关系时，也不被认为是真正的男同性恋者。直到今天为止，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的社会和个人以及一些媒体，他们立论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社会感知性别来区分谁是同性恋和谁不是同性恋。

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同性恋都被认定为是一件羞辱和可耻的事情。宗教贬损它为罪恶感，医学和心理学认为这是一种病，而法律上则宣称它是非法的。甚至，同性恋者



▲ 王尔德画像

会被抓起来，被判刑入狱。这其中历史上有名的就是对于英国著名文学家奥斯卡·王尔德的惩罚。当社会上开始赋予这种现象以名称的时候，同时也在抹消它的真实存在。正如王尔德所描绘的“那是一种不敢说出名字的爱情”，而他的情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也描述了广为传颂的“两种爱情”，这就认定了男女性恋之外的另一种爱情的存在和可能。

差不多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同性恋似乎在官方和正式的场合都不曾存在过，更不要提其它那些性行为和现象了，它们更是被同性恋、异性恋这样一种两元划分法的界定所彻底忽略掉了。人们很少在大众流行媒体上看到，电影的故事里也绝少出现，而且在所谓

文明的交谈里也是很不妥当、极不适宜的。有不隶属于正常性范畴的怪异人士们，通常只好秘密地生活着、他们对朋友、同事和家人亲戚都隐瞒事实的真相，潜伏在一种所谓“密柜”生活的状态中。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使同样有着怪异倾向的人无法了解对方，也无从获得消息的认知和身份的共鸣。有的人接受了医学上对性取向的认定，认为自己的确有病，或者说是着了魔。所以，早期捍卫同性恋权益的激进主义者依照医学模式的界定，呼吁停止对同性恋者的偏见。但是他们只提出：同性恋者不该受到惩罚，而是可以通过医学的治疗和心理的调整，从而转变回归到“正常的”异性恋者社会当中来。

尽管如此，怪异人士的社区在西方国家城市区域的发展在不断壮大。这些聚集着怪异人群的社区发展着自己亚文化的实践，以此来回应异性恋中心主义者的主流社会。这个时候，他们开始用另外一个词汇“gay”来指认自己。非常有意思的是，gay这个词同今天用的queer这个词很相近：它总揽了各种性行为和性取向，包括婚姻之外的同性恋、异性恋和卖淫等等。这就公然挑衅了传统婚姻家庭的组建模式。如果一个人过着“gay”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他、她在性方面是自由的，也不一定局限为同性恋的生活方式。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战时期，美国军队颁布了禁止同性恋的条文，这反而促使了20世纪以来同性恋者在怪异社区人数的增多。那些选择非异性恋者生活方式的男男女女们，他们都从军队里退役免职。然后，这些人通常都定居在他们被免除服役的海港城市，由此拓展了原有怪异社区的人口和规模。随着这些社区怪异人士数量的增多，他们开始出现在媒体和评论界，开始发表言论，并且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在英国，1957年颁布了《沃尔芬登报告》，该报告的主题就是提出同性恋者不该受到歧视，而且呼吁就同性恋的议题，在法律、道德、和社会学等各方面展开全面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而且是更为年轻的活动家，他们追随着早年妇女和有色人种的作为，认识到同性恋的存在也有自己的公民权益，他们开始要求在法律上的得到公正平等的对待。这个时候的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发生在1969年6月美国纽约城的“石墙抗争事件”。因为一群同性者在酒吧遭遇警察的逮捕，由此引起的同性恋组织的集体抗议，这次行动被看作是现代男女性恋争取权益运动的开端。虽然，在此之前，北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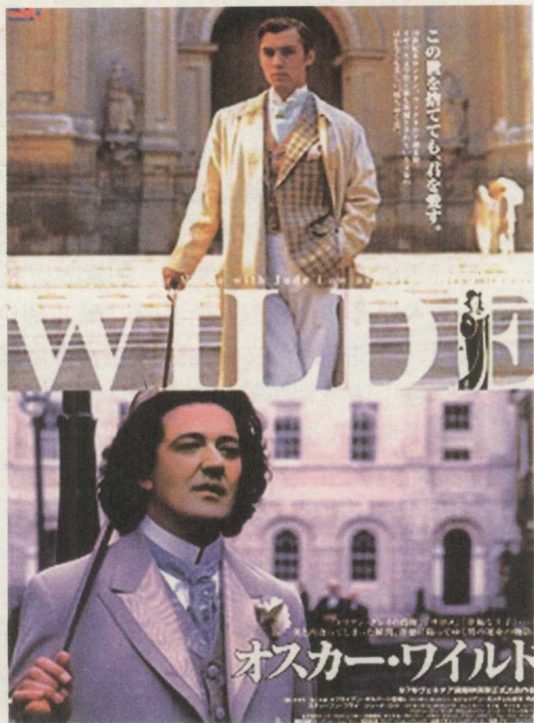
他地方以及欧洲，都出现过各种各样同类性质的游行、示威，以及媒体就此展开的广泛讨论，但是“石墙事件”的影响更为深远，所以成为了同性恋运动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许多性取向上不同于常规的怪异人士，拒绝依照过去医学和法律既定建制的说法，没有使用“homosexual”这个语汇。而这个时候“queer”这个词还是如同骂人时用的“faggot”（男同性者）和“dyke”（女同性恋者）一样，是表示蔑视的贬义词，所以更多的人偏爱选择“gay”和“lesbian”来表述自己。这些在性方面有不同取向的人，他们向前所迈的这一步，即自己认同了自我身份，并找到属于并合适自身的语汇来表达，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进步。这种“出柜”的举动向以异性恋为主导的世界证实了同性恋者的确存在，而且是无处不在。他们也不再为自己的性取向感到羞愧和耻辱。

就在“石墙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内，许多北美的报纸和杂志都开始宣称新自由解放运动的诞生，这些媒体都呼吁要求公正平等地对待同性恋者。从此，每年6月的时候，许多的大城市都会举行同性恋的庆祝活动，伴以同性恋大派对和游行示威，以此来纪念“石墙抗争事件”。各种各样的男女同性恋团体，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组织都开始成立。同性恋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他们挑战过去那些针对同性恋者在法律和医学方面的歧视性界定。这个时候，有关方面迫于压力而做出的回应，也是同性恋运动的一次巨大胜利，那就是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74年的时候，把原来认定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的条款从正式的界定里给剔除出去。

很多早期的同性恋自由解放的宣言都显得异常酷儿化——它们号召要认识到性方面的多元流动状态，以此来解构纯粹的异性恋、同性恋的两元分法。但是，最初这样激进的性行动主义的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逐渐退潮为只是特别关注男女同性恋者的平权运动。这场运动的组织者和激进分子所持的基本立场就是说，男女同性恋者“生来就是如此”，所以他们也应该获得同等的权利。这样一来，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忽略甚至否定了性欲存在的流动可变状态和实践。双性恋者和性转换者，他们本来是更愿意支持性欲的多元可变状态和实践，结果在早年为争取同性恋权益的组织和活动中被推到边缘和局外人的位置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也开始分野。主张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的人，她们切断了同男权家长中心社会的联系，而男同性恋者在城市的中心建立了很多纯男性的社区。由此形成的男女同性恋的亚文化开始对自己所属的成员施加压力和影响，要求他们各自遵循一定的生活方式：其中有的对女同性恋者的衣食和言谈举止做出了规定和限制，以此在同性恋当中形成一种“无性别”的姿态和面目。这场争取

▼《王尔德》海报



同性恋者权益的运动发动了一场针对异性恋才是正统这一说法的叛乱。但是，不无讽刺的是，这场运动在本质上只是性别身份的分类上更加细化，其出发点和思维方法依循的还是传统模式，依旧没有走出误区，去迎接一个更为自由开阔的可变性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两个相互关联的事实再次把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社区和阵营的人联合在一起：那就是艾滋病危机和基督徒正统派思想。后者所持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把艾滋病的降临看成是对同性恋者的“天谴”。这个时候，激进右派的方针是标举传统的异性恋中心论和价值观，他们在艾滋病爆发的最初几年里，阻止相关政府部门采取任何积极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在美国，总统里根基本上采取漠视不理的态度和立场，用于艾滋病研究的基金投入非常少，而针对艾滋病教育的宣传活动根本没有提供资金的帮助。鉴于这样的态势，男同性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性转换者，加上这些人的朋友和家人，他们联合在一起，共同抵抗这场危机。这中间也还有由保守派发动的其他一些异性恋中心主义者的行动。在这次广泛的联合统一战线中，许多的积极分子开始用“queer”这个词（比如，有一个组织就叫Queer Nation）来组织成立一个“大一统联盟社区”（“community of difference”），以此整合了各种性别身份和性行为的人。这个时候“queer”这个词，不仅意味着人们开始认同在男女同性恋者当中也有很多的方式和状态，而且它还把过去依照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划分法无法涉及、也无从界定的其它性取向的人也纳入其中：这中间就包括双性恋，异装人，性转换者，不同种族的配对者，无论他们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另外就是残障人的性欲，施虐、受虐者的性欲，也不管其中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这样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身份、欲望的状态和取向都得到了人道的认可。“queer”这个词聚集整合了多样边缘的族群和个体，让他们为了一个统一的政治斗争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由此，这个主流异性恋中心论者用来压制别的族群的语汇，在作为一个蔑视贬损的词汇在用了几十年之后，获得了新生。

当众多的酷儿积极分子和活动家在大街上游行示威的时候，遍及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学术界开始讨论这个标识为“酷儿理论”的东西，到底有何含义？由此以来，酷儿理论纵横跨越了诸多相关的学科领域，包括哲学、历史、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传媒等的研究。这门学科也是基于性别政治学的聚合而发展起来，其中涉及了种族、阶级、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研究，以及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潮流的谈论范畴。这股潮流和趋势质疑了对一切基于欲望、身份的既定分类，动摇了其传统的牢固不化的基础。酷儿理

▼《王尔德》海报

